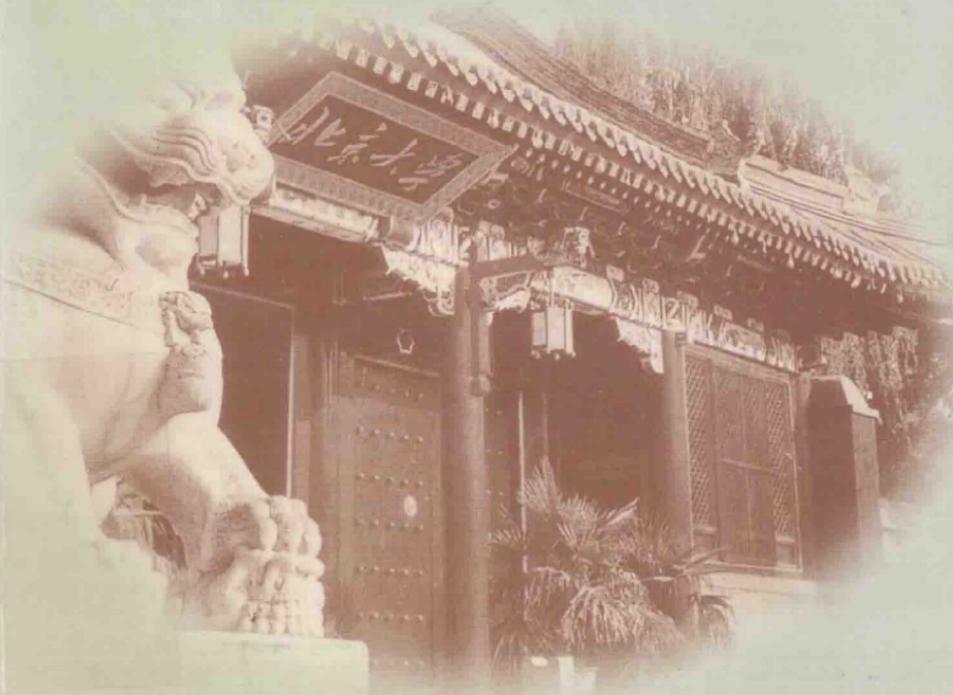


北大恩师

张友仁 著

我的大学·李大钊同志与北京大学经济系
回忆狄超白教授·艾思奇同志与北京大学·
西南联大学生日记中的闻一多先生·
学者和战士·悼念一代宗师陈岱孙教授·
回忆冀贡泉教授在北京大学



华 ◎ 艺 ◎ 出 ◎ 版 ◎ 社

北大恩师

张友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恩师/张友仁著.-北京:华艺出版社,1999
ISBN 7-80142-173-6

I . 北… II . 张… III .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2439 号

北大恩师

张友仁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 1 号)

邮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

北京广内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12 印张 301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142-173-6 / I · 111 定 价: 19.8 元

序 言

张友仁教授的散文集《北大恩师》即将由华艺出版社出版。他要我为此书写篇序言，我很高兴，愿意趁此机会写几句话。我和友仁同志相识并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共事，已有45年了。在长久岁月里，我们一起教学，一起参加教育改革和各种活动，逐渐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建立起亲密的友谊。

友仁同志早年在北大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教龄至今已达51年。他受业于北大的许多名师，经历过北大的许多重大事件，对北大往事知之甚多。因此，业余时间经常应约写一些散文。这些散文以第一手的真实材料反映了许多一代名师的风范和半个多世纪以来北大的变迁。

友仁同志是1942年经浙江省全省中学毕业会考，以优异的成绩保送入西南联合大学的。那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大学因抗战而联合起来迁到云南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由于战时交通阻隔，他于1943年秋才历尽艰辛跋涉数千里到达昆明，进入西南联大求学。他不仅按照教学计划的要求，选读了经济系的各门课程，而且还广泛涉略文、法、理学院的课程。在战时大后方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西南联大师生以其争民主的英勇斗争，赢得了“民主堡垒”的光荣称号。他积极参加了包括“一二一”运动在内的各次爱国民主运动，结识了许多民主斗士，并且受到深刻的革命教育。1946年春西南联大的使命宣告结束，他在昆明参加了联大的结束大会，然后随同学复员，行程九千里，迁回北京。1946年秋在北京旧国会礼堂参加了北京大学的抗战胜利后复校开学典礼。他在西南联大的求学经历，使他有机会成为西南联大、

北大、清华、南开等我国四所著名大学的校友。结识了我国当代的许多名师，听过他们的课程或讲演，得到他们的指导。

早在 1946 年，他就在《文汇报》、《浙江日报》和《读书通讯》等报刊上，发表有关北大生活、一代名师和学生运动等方面的文章。如《在北风里颤抖着的教授们》，真实地描述了解放前国统区教授们的爱国斗争生涯。在《许德珩》一文中，生动地记录了他与反动官僚之间的斗争。这些文章在当时就受到北大同学们的重视，同学们把它们张贴在北大民主广场上，供大家阅读。在 1946 年底他在《文汇报》上发表《毛子水——他与北大图书馆》一文后，在同学中激起很大反应，他们包围了校长胡适和图书馆长毛子水，向他们请愿，要求北大图书馆采购进步书刊。

1947 年他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取得北京大学法学士学位，留校任教，并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北大地下党的领导下，做了许多革命工作。作为一名党员老师和北京大学法学院法政经济记录室负责人，他在 1948 年冬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校庆纪念期间，举办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及苏联文献展览和北京大学法政经济记录室展览，并为这两个展览会撰写了展览说明。北京解放前夕，他利用北大法学院图书资料室书库，为北大地下党保存了大量文件和资料，还为北大的进步社团隐藏了数以千计的革命和进步书刊，从而使得北大的进步书店在北京一解放就得以开张售书。他还积极参加了阻止北大南迁和迎接北京解放的工作。

北京解放后，他继续在北大任教，并担任北京大学政治课教学委员会委员兼政治课教员。他不但自己开设三门新的政治理论课程，而且还协助经济系主任赵乃抟教授、樊弘教授延请了一批著名经济学家到北大经济系任教或讲学。1950 年在北京大学红楼参加建立李大钊纪念堂和毛主席工作室，并于 5 月 4 日举行揭幕典礼。1952 年他参加了北京大学的院系调整工作，通过院系调整，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四校的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组建为新

的北京大学经济系，北大也从城内迁到西郊的燕园。这时他参加筹建了北京大学第一个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并长期负责该教研室的工作。

友仁同志不但亲身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北大生活，而且阅读过北大的许多历史文献。如1946年在北大西斋接触过京师大学堂成立时期的大批原始文献，1950年在北大红楼地下室东头接触过蔡元培先生任校长时期的北大原始文献。北京解放前后，他曾为北京大学博物馆筹备处提供过有价值的校史资料、实物，并被赠予“北京大学博物馆之友”的荣誉称号。这些校史资料和实物，现在仍被妥善地收藏在北京大学赛克勤博物馆中。今年，我们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史展览会上还可以见到他提供的有关北大校史的多种资料和实物。该展览会在它们的说明中一一写道：“张友仁教授捐赠，赛克勤博物馆提供。”

改革开放以来，友仁同志作为北京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曾五度应邀或奉派出国讲学。第一次是在1982年，由我提名，经张龙翔校长推荐，得到加拿大方面的邀请，前往加拿大十所著名大学旅行讲学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85年经国家教委派出，作为中荷两国间的交换教授，赴荷兰国两所著名大学讲学。1987年应邀到西柏林自由大学任教授。1988年应邀到丹麦哥本哈根大学、阿尔胡斯大学、法国人文科学院和英国剑桥大学讲学和访问。1989年又应加拿大政府的邀请前往讲学、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后来又应波士顿大学、坦普尔大学、维吉尼亚大学、加州综合大学和联合国的邀请，于1989和1993年两度赴美国访问、讲学和从事合作研究。

他在国外讲学的内容并不是他所专长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问题。例如，他在西柏林自由大学开设的两门研究生课程就是《1979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通过讲学，他向国

序 言

外各大大学介绍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的成就，满足了国外学者们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高度兴趣。另一方面，他借多次出国的机会，亲身了解国外的社会生活，回国后撰写了一批反映国外见闻的文章。

友仁同志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他长期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不是专业的散文作者。但五十余年来，他应各报刊的约请，仍挤出业余时间，撰写了一百多篇散文。由于年代久远，各大图书馆中收藏的报刊残缺不全，虽然得到了有关人员的大力协助，收入本文集的友仁同志的散文，仍很不齐全。这些文章生动地阐述了北京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忠实地记录了师生们的革命斗争，描述了教授们的生活情态和学术贡献，阐发了一代宗师和学术泰斗的崇高精神和优秀品德，是对北京大学这一时期学术和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在我看来，这本散文集的主要特点和优点就是真实，它十分真实地反映了北大生活和北大人的精神面貌，值得当代青年们学习，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因此，本文集的出版，是值得庆贺的。

友仁同志有十分丰富的阅历，但是他并没有将自己所了解的许多北大往事一一写出。萦怀往事感念多，我希望友仁同志今后能将他所参与、所了解的许多北大往事陆续写出，我也希望他能将他所熟悉的一代名师和学术泰斗的音容笑貌和文章风范陆续写出，我还希望他今后能将他所经历的国外讲学见闻陆续写出。它们必将为进一步为我国学术界提供第一手真实的原始资料。我十分殷切地期待着！

胡代光

1998年8月30日于

北大经济学院

目 录

序言	胡代光	(1)
我的青少年时代		(1)
我的大学		(9)
北京大学图书馆和我		(34)
经济建设人材的摇篮		
——回忆西南联大经济系、商学系		(39)
一代名师		
许德珩(上)		(45)
附：许德珩教授来信		(49)
许德珩(下)		(50)
毛子水		
——他与北大图书馆		(53)
做淘沙者、拓荒者，为后人铺路架桥		
——赵乃抟传略		(58)
李大钊同志与北京大学经济系		
——在李大钊同志诞辰九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	(84)
回忆狄超白教授		(88)
附：狄超白教授夫人何兆铃同志来信		(92)
狄超白传略		(93)
附：狄超白教授夫人何兆铃同志来信		(101)
附：狄超白教授来信		(102)

艾思奇同志与北京大学	(103)
附：艾思奇教授夫人王丹一同志来信	(110)
西南联大学生日记中的闻一多先生	(111)
附：闻一多教授的孙子闻黎明同志来信	(122)
学者和战士	
——深切悼念吴晗老师	(125)
烈士丹心 史家本色	
——深切怀念吴晗教授	(154)
悼念一代宗师陈岱孙教授	(167)
陈岱孙	(182)
诲人不倦的经济学说史家陈岱孙	(207)
回忆冀贡泉教授在北京大学	(238)
周炳琳教授与闻一多教授	(241)
周炳琳教授和共产党人的友谊	(255)
国民党的革命派周炳琳先生	(261)
经济学教授周炳琳传略	(270)
忆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邓拓同志	(298)
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楷模江隆基	(306)
蒋硕杰教授的经济思想	(313)
深切悼念蒋硕杰教授	(322)

国外见闻

加拿大讲学归来	(331)
附：加拿大《华声报》报导	(336)
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白求恩广场	(338)
访加拿大杰出公民谭振樵先生	(341)
荷兰讲学日记	(349)
世界第一大港——荷兰鹿特丹港	(359)

西柏林来信.....	(362)
巴黎日记.....	(386)

孙文和黄兴回国孝宗南归，督学山西大同山西丁巳都司典史。是年夏，孙文、黄兴、黎元洪、宋教仁等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文任临时大总统。孙文、黄兴、黎元洪、宋教仁等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文任临时大总统。孙文、黄兴、黎元洪、宋教仁等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文任临时大总统。

我的青少年时代

我的原籍是浙江省黄岩县土屿村，但于1923年出生在浙江省上虞县五夫镇。那时，父亲在浙军中任职，部队驻扎在五夫镇，家也就住在五夫镇牟山湖的附近。在我的少年儿童时代，随着父亲工作上的调动，我到过黄岩、徐州、乐清、南京、郑州、天津、北京等地。

1928年秋，我考入南京东区实验小学一年级读书。在长江路和大行宫那一带，起初是元末群雄割据时代吴王张士诚的儿子修建的规模很大的王宫。后来王宫的主要部分成为两江总督府的所在地，太平天国时期又成为洪秀全的天王府，民国初年是孙中山先生的临时大总统府，再往后是南京国民政府和参谋本部所在地。王宫的西端后来成为清代帝王的行宫，乾隆皇帝几次下江南时就曾在这座行宫住过。我上小学时，那里还有十分别致的既曲折又有斜坡的回廊和中式的庭院。

北伐军攻入北京后不久，我跟随父母于1928年秋在北伐军之后进入北京城。火车途经天津附近时，铁路两旁发了大水，还有成群嗷嗷待哺的灾民和不少死尸。到了北京，初次看到古都如此雄伟古老的建筑，颐和园、中山公园和北海的风景都令人神往。得到机会在长安大戏院观看梅兰芳先生的京剧表演，可惜我那时候太小，不到五周岁，还没有能力欣赏。清华大学教务长吴之椿教

授带领我们游览了西山八大处等名胜，回到清华园乙所我舅父周枚荪教授的住所。清华园优秀的学术环境，美丽的建筑和校园景色，注入我幼小的心灵。长辈们建议我长大了也读清华大学。

我在南京东区实验小学读书期间，赶上了中山陵的修建。建筑材料不断地从小学旁边的中山东路拉过，起初仅靠人力，笨重的建筑材料只能一步一步地缓慢东进，后来开来一辆原始的蒸汽机车，建材行进就快多了。1929年6月1日举行孙中山先生灵柩安葬于中山陵的典礼，那时称作“总理奉安大典”。灵车从停泊在下关江边的中山舰上迎来，在军乐队的前导下缓缓前进。紧跟着的是执绋中的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后面是许多送殡的官员、部队和群众，沿着中山东路往东出中山门步行前往中山陵。我们的小学校就在大行宫路和中山东路的拐角处。我和同学们一早就到中山东路南边的人行道上列队沉痛地悼念我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向他的灵车致敬，目送他的送殡行列东去。

后来，我转入南京长江路南面的汇文小学读书。不久，由于长江路北边修建“国民政府”大门，马路向南拓宽，汇文小学校舍拆除成为马路，学校并入附近的复兴小学，我也就转入该校继续攻读。我家原住南京沐府西门，南京建都后，房东认为将沐府大院改作旅馆有利可图，就一再要我家搬走。我家不得不搬到竺桥，由于离学校远，我和妹妹每天中午回不了家，只好由人送午饭到学校来吃。后来搬到中山东路三条巷的一座楼房，仍和青年军官焦绩华先生分住。他那时还没有结婚，在参谋本部任参谋，经常带我到南京各地玩。他教我既要有大胆勇敢的气魄又要用科学认真的态度。从他的身上我学到一些优秀的品质。“七七”事变以后，他英勇地战死在抗日战场上。

1930年秋中原大战后，我家从南京迁往郑州。1931年初我随母亲和弟妹坐上一节货车车厢从浦口出发离开南京。火车先北上到徐州，在铁路招待所住了一夜，换挂陇海铁路局的机车西行。这

时，北风凛冽、积雪很厚，开始领略到北方严冬的滋味。黄岩同乡陈安宝团长也搭乘我们这节车厢北上，他在北伐战争中是首先攻入济南城的先锋营营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第26军军长，英勇杀敌，1939年5月南昌会战中壮烈牺牲，追晋为陆军上将。延安各界也为他举行追悼会，毛主席送了“尽忠报国”的挽词。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到了郑州，由于父亲在陇海铁路管理局任职，我就考入扶轮小学（现名铁路小学）三年级第二学期读书。记得那时在这所小学就开始学习英语了。小学里面有两处防空洞，是蒋阎冯中原大战中冯军为防止蒋军空袭留下的。那时，防空洞中还住着一位战败了的冯部的伤兵。过了不久，他伤势转好，就一瘸一拐地离开防空洞一路要饭回家去了。

同年9月18日沈阳事变发生，小学生个个义愤填膺，要求抗日救国，人人用黑布书写“抗日救国”或“反日救国”四个白色大字带在袖上，高喊抗日口号，参加军事操练，情绪甚为高涨。我的语文教师于斌老师，不但教我正课，而且指导我课外阅读《水浒传》等白话小说。1932年夏，我在郑州扶轮小学初小部毕业。

这年暑假，家里迁到叫作陇海园的陇海铁路职员住宅区，我就考入附近布厂街的郑州私立第一小学高小部读书。那是当时一所教育比较严格的小学。有完善的图书馆，有富有教学经验的老师们。在语文教师王崇吾老师的介绍和指导下，我开始阅读鲁迅的《傍徨》、《呐喊》等著作，还有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斯蒂文森的《金银岛》等书。那时，意大利作家亚美契斯的《爱的教育》一书在小学生中甚为流传。数学课程教得很深，我学会了用算术方法解答一般的代数题，那是难度很大又很能锻炼思维能力的。除了国语、英语、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程外，还有音乐、图画、劳作、体育、童子军等课程。图画教师那伯川老师很欣赏我的图画，说线条画得很自然、美丽，可惜我后来对图画没有特

殊的兴趣。那伯川老师还教我们劳作课，劳作课要做一些作业，练习实际操作能力，最后一次作业是做一台矿石收音机，我做好一台笨重的原始的矿石收音机，交给那伯川老师了。

这所小学，还有严格的童子军训练。当时日寇侵华步步进逼，报纸上的大字标题是“锦州失守”、“榆关失守”等，南方是上海“一二八”事变。小学生的童子军训练，主要是为抗日战争作准备。每天下午课后都在陇海园东北角的大操场上操练，还要学习用童子军棍和童子军绳迅速绑成担架和抬担架等。往往要一直训练到天快黑了，旁边树林中的暮鸦归巢的时候，准备将来到战场上上去抢救伤员。1934年夏天，我在该校高小毕业。

小学时期，我曾有过两位家庭教师，一位是我的堂叔张士载先生，他在家中为我补习英文。另一位也是我的堂叔张若云先生，他曾以第一名的成绩在旧制黄岩中学毕业，擅长书法，写得一手好字。还擅长中医。可是在旧社会里，他的才华不能发挥，只能在陇海铁路管理局当一名书记员。他教我古文和习字，在他的教授下，我学过新式小学里学不到的《幼学琼林》和《古文观止》等文言文，还学了古诗。高小时期，陇海铁路管理局副局长兼工务处长凌鸿勋总工程师是我家北边的邻居，那时他已调往株洲负责修建粤汉铁路，经常不在他的花园洋房住宅中，我父亲同他在中原大战后修复陇海铁路的各座大桥时密切地合作过，后来又在陇海铁路管理局共事。虽然，我父亲既不懂工程技术也不管工程业务，可是对于凌总工程师却十分敬佩，曾劝我以他为榜样，将来也学习土木工程，做一名工程师。

在我读高小的时候，父亲已患肺癌。那时郑州的同仁医院虽然已经装备有X光机，透视出肺部有阴影，可是却被医师误诊为肺结核，久治无效后才不得不到北京来治疗。我随父母乘坐由陇海铁路局派出的一节车厢，挂在平汉铁路局的火车头上，开行两天两夜之久才从郑州开到北京前门西火车站。那是1934年7月1

日。先是住入位于北京西城的肺结核专科医院治疗，后经协和医院检查知是肺癌，才改住入德国医院（现北京医院）病房，同时到协和医院用放射性元素镭治疗。可是，已经为时过晚，不久父亲病逝于德国医院。

在北京，我投考中学，考取了育英中学和艺文中学。那一年全北京市中学毕业会考，高中第一名和初中第一名都被育英中学的毕业生取得，她是一所很有名的教会中学，位于灯市口大街，现在改名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艺文中学位于西长安街，是北师大毕业生创办的实行道尔顿制的一所新型中学。我选择了较著名的育英中学入学，但对这所位于天安门西边富有朝气的艺文中学，以及口试录取我的热情亲切的老师，感到十分依依不舍。那时我还不到十周岁，在育英中学校内寄宿，得到很多大同学们的帮助。育英中学的图书馆，办得很好，图书收藏丰富，是中学图书馆的模范。初中一年级有学生三百多名，我被分配在中一戊班。一年级的课程多达十余门，而且要求都很严格，尤其注重英语和体育教学。语文课开设文言文和白话文两门，由不同专长的老师担任。动物课要学生自己动手解剖兔子，植物课要学生动手采集和制作植物标本，等等。我那时虽然年幼爱玩，但也被迫学到不少知识。公共卫生课程由魏文贞老师任教，她除了给我们讲课外，还在课外领我到协和医院去检查身体，准备割除扁桃腺，等等，使我至今记忆犹新。后来，她在清华大学医院任校医，是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著名教授施嘉炀先生的夫人。

《清季外交史料》巨著的编者王亮（希隐）先生是育英中学董事长，是黄岩籍人。他来校时曾叫我到校长室去见面，勉励我好好学习。育英中学是一所教会中学，校舍西边就是公理会教堂，但学校并不强迫学生信教。我参加了一个社团，在社团活动中参观了北京的一些工厂和名胜古迹。

由于父亲病故后，家母从郑州南迁黄岩原籍。我向育英中学

李鹤朝校长提出转学的要求，蒙其同意，发给转学证书。1935年秋我来到杭州，考入当地著名的安定中学。校长孙信先生，是北京大学早期毕业生，语文教师江文炜先生，曾经有过进步思想，坐过牢。当时处于国难时期，也叫非常时期，大家都有打仗的准备。杭州市曾模拟敌机空袭的演习，在西湖丢下催泪弹，在湖滨列队的我们都尝到了它催人泪下的滋味。国难当头，同学们十分关心时事，经常看报和要求老师们给讲讲时事，所以同学们对国际国内大事了如指掌。1936年浙江省立图书馆少年部举办了青少年时事竞赛考试，我参加了。由于安定中学老师们对我的教育，我获得第一名，得到浙江省立图书馆编辑和出版的《图书展望》杂志一年作为奖品。

在杭州安定中学读完一年以后，暑假回到家乡黄岩，接受母亲的劝告，就近考入黄岩县立中学继续学习。那时，郑燮卿先生任校长，虽说是一所县立中学，教学质量却可以与外地著名中学相较量。后来，在1942年间黄岩中学曾荣获浙江全省中学会考第一名的好成绩。对我最有帮助的老师有数学教员管昌侯老师，他自学成才，智力过人。还有国文及英语教员管观韶老师，他精于书法，兼任中学文牍。赵绳孙老师教我们劳作课，既有木工又有金工，我学会了焊接金属，曾用马口铁皮焊成一只小手提箱。黄岩中学的童子军训训练是出色的，我曾参加童子军活动，到普陀山岛千步沙滩上搭起帐棚露营，自己动手抬水做饭等等。初中时期，我仍很爱玩，不努力学习功课，只满足于各门功课都及格。例如，学英语，稍会一点都满足了，自己认为反正我又不会出国，从而不求熟练。可是，没有料到数十年后我因工作需要多次应邀和奉派到国外许多大学讲学，这时就常常感到自己的英语不够熟练，中小学的英语基础没有打好。这时，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1939年初我在黄岩中学初中部（战时设在灵石）毕业后，按照规定经过升入高中的考试，才升入黄岩中学高中部。时在抗日

战争的紧张阶段，敌机空袭和频繁轰炸，高中部先是搬迁到黄岩西乡下岙的崇法寺内，一个学期以后又搬到西乡灵石书院旧址。继郑燮卿先生之后的校长，先是诗人吴文先生，后来是江文炜先生。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有从杭州一带沦陷区跑出来的一批富有教学经验的中学教师到黄岩中学任教，如语文教师江翼时先生、吴文先生，数学教师林子仁先生，同鲁迅先生有过密切往来的英文教师王育和先生，化学教师从日本帝国大学留学归来的毛乃琅先生，浙江大学毕业的物理学教师马启义先生，医学常识教师周子序医师，等等。他们大大地加强了黄岩中学的师资队伍。

灵石的环境极为幽美，依山近水，相传为唐代诗人李义山读书处，南宋太常少卿谢伋隐居及种药处。灵石寺建于东晋年间，大雄宝殿由四十根硕长的方形石柱支撑而成，后来我出访世界各国还没有见到过同它类似的建筑物。寺前有高塔，已倾斜，成为中国的斜塔。自清代末叶起，改建为灵石书院，院内有美丽的白莲池和千年古樟树，是谢伋当年的药园遗址之一。我在这风景优美的环境里广泛地阅读了古今中外的图书。我们的教室设在魁星阁楼上，是读书的好地方，也是凭窗眺望的好去处。

我们还在灵石的山谷中学习军事，有少校军官作为我们的军事教官。我们按照《步兵操典》进行实战训练，练散兵行和散兵纵队、匍匐前进等。高中军训期间，我曾参加军训队伍步行行军到邻县奇峰异石山水绮丽的雁荡山。1941年4月日军侵入黄岩县城，西进逼近灵石，学校被迫停课疏散，学生有的分散回家，有的随少数教师迁到黄岩最西边的宁溪山根的一所王姓的祠堂中。不久，敌军退出黄岩，学校复课。

高中时代，我开始勤奋学习，各门课程都力争彻底学懂，取得优秀的成绩。中学时代我和许多青年人一样，也曾爱好过文艺、诗歌，可是我的兴趣逐渐从文艺作品转为文艺理论。为了搞清楚文艺理论上的一些问题，我要从社会科学中去找解答，抗战时期